

政府城市发展意志与 中国区域城市化空间推进

——基于《政府工作报告》视角的研究

侯新烁 杨汝岱*

摘要: 中国区域城市化绝非简单的人口空间转移,政府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具有主导作用。借助2002-201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以相关有效关键词词频对政府意志进行描述,并构建空间面板模型阐释政府意志影响城市化推进的作用机制和空间传递渠道。结果表明:区域城市化推进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格局;中央和地方政府意志呈现明显分异特征,致使实践分化为“市化”和“镇化”两条道路;政府意志作用发挥依赖于产业、投资和人口三种支撑渠道,人口跨区域流动是决定政府意志得以贯彻实施的空间驱动力量。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区域城市化,政府的意志调整和实践约束将重塑城市化空间格局,但其作用发挥并非是无条件的,政府意志安排更需“因地制宜”和“顺势而为”。

关键词: 政府意志;政府工作报告;关键词词频;空间传导渠道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的城市化绝非简单的人口空间转移,处处布满政府意志的表达;意志导向何处,运动轨迹就会偏向何方。中央和地方政府目标差异性诱导区域城市化非均衡发展,并非既有理论可解释(何燕、周靖祥,2013)。政府引导中未遵循或高或低、或快或慢、或早或迟的阶段性差异的一般规律,才是城市化失序的根本原因,本质上是政府倾向意志(多大程度上愿意推进城市化)对城市化格局塑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透过灯光数据审视集聚状况(Henderson et al.,2012),沿海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网络式城市化格局已经形成,内陆地区则多受制于政府主导行为使得城镇化演变为一场“运动”(李强等,2012),城市化明显受到政府意志的干预。破解城市化滞后难题,需要空间布局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李克强,2012),更需认识和强调政府力量嵌入“城市化空间差异性推进和不同路径选择”之中的特征事实。

*侯新烁,湘潭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400015,电子信箱:houxinshuo@126.com;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rdyang@pku.edu.cn。

本文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区域人口流向空间匹配模式及其局部双边增长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5YJCZH063)、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优秀青年项目“人口流动的流向变化、空间模式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B246)、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人口流向、结构转变与区域增长关系的空间尺度研究”(项目编号:14YBA357)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大量文献从城市化模式、问题与矛盾、推进动力等多方面探讨了相关决定因素(周靖祥, 2015; 陆铭等, 2011; 王小鲁, 2010; Au and Henderson, 2006), 经济禀赋和人口推拉因素已经得到深入分析(龙奋杰等, 2010; 简新华、黄锬, 2010; 刘生龙, 2014)。然而, 中国城市化推进有其独特性(辜胜阻, 2013), 仍存在诸多有待识别的学术问题: (1) 既有研究认为城市化水平由要素城乡配置和产品贸易均衡条件共同决定(钱陈、史晋川, 2007), 但城市化的决定要素和机理并未达成一致; (2) 中国城市形成不只依附于工业化和人口集聚(周飞舟, 2012), 影响各级城市建设的政府意志决定了地区城市化过程, 因此城市化推进中, 中央政府的统一意志和地方政府的分异倾向的空间异质作用不容忽视(陈斌开、林毅夫, 2013); (3) 较为遗憾的是, 尽管已意识到政府之于城市化的诸多干预和影响, 但政府行为及其作用常被“行政主导型城镇化”一语概之, 并多以地区或时间虚拟变量作为“政府影响”的代理展开定性分析, 探讨影响方式和机理逻辑的文献甚少, 更遑论探讨政府意志、空间力量驱动城市化的机制研究。本文观点是, 中国的特殊性表现为政府意志倾向引导城市化空间推进, 存在影响因子的空间交互渠道, 所以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相同步、政府积极倡导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纪韶、朱志胜, 2013), 需从区域空间驱动视角展开政府意志干预城市化的推进机理和渠道机制分析, 探寻区域城市化格局演变规律、阐明政府意志的作用效果及空间交互机理。

本文的主要贡献: (1) 将中央和地方政府城市化发展中有偏向的意志表达纳入到城市化水平决定模型框架内, 其代理变量创新性地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城市化”推进相关有效关键词的词频刻画(有效性以专门关于城镇化或城市化问题的叙述作为识别依据), 反映政府在城市化推进中的意志体现和战略倾向; (2) 构建包含政府意志、经济数据和空间属性数据相匹配的空间面板模型, 检验省份间空间溢散过程以识别城市化发展的实现机制渠道。抓住政府意志左右城市化进程这一特征事实, 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展开政府意志、空间驱动与区域城市化推进的关联机理、支撑渠道和空间路径甄别, 以阐释区域城市化推进的内在机理过程, 这是文本区别于既有文献的重要创新点所在。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一) 理论模型

中国城市化推进与政府意志表达关联密切, 省份间竞合与地理空间差异促使研究关注意志作用的空间交互过程。究其根源, 逻辑起点源于政府在不同区域空间上有差异的推进倾向, 意志引导行为实践, 成为解释中国异质性区域城市化分布的重要切入点。查阅相关文献, 区域城市化水平主要由经济因素的“拉力”(刘生龙, 2014)、人口因素的“推力”和人口年龄结构的约束(郑真真、杨舸, 2013)以及地区投资行为促成城市建设(莫亚琳、张志超, 2011; 李郇、洪国志, 2013)等因素决定, 这些变量将成为本文重要控制变量。

接下来对含有空间效应的政府意志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和考察变量进行简单介绍。以Cobb-Douglas型城市化推进模型为基础展开扩展, 假设城市化受多重因素约束(因城市化水平为一百分数变量, 为便于模型经济含义解释, 以自然指数形式设定初始方程)。(1)式中, U 为省域城市化率; Z 和 D 分别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城市化意志倾向水平; X 为其他重要影响变量, 本文中主要涉及经济性、人口性和资本性变量, A 表征城市发展的技术效率水平。

$$e^{U_t} = A_t Z_t^\alpha (D_t^\beta) X_t^\eta e_t \quad (1)$$

$$U_t = \ln A_t + \alpha \ln Z_t + \beta \ln D_t + \eta \ln X_t + v_t \quad (2)$$

依据城市化推进过程所具有的省域空间关联性和中央政府意志的导向性,构建城市发展效率水平的函数形式。其中,因由地方政府推进意志存在异质性,本文假设不同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意志倾向与中央政府意志表达具有差异,此种设定更为符合实际。

$$A_i = \Omega_i Z_i^\phi (D_i^\varphi) X_i^\theta \prod_{j \neq i}^N A_{ij}^\gamma w_{ij} \quad (3)$$

该函数描述省份 i 城市化推进的技术水平 A_i 依赖于三个部分:(1)部分技术水平是外生的,且对于所有省份都相同,因此设定 $\Omega_i = \Omega_0 e^{\mu}$, μ 表示外生的技术进步;(2) A_i 会随中央和地方政府意志倾向程度(Z 和 D) 发生变化,参数 ϕ 和 φ 指示城市化意志的溢出强度,借鉴 Arrow 和 Romer 对投资的知识溢出的处理方法,设定政府意志不但形成城市化的动力,同时通过溢出增进所有单位的城市发展技术水平;(3)空间外溢性会使得来自政府意志主导和来自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限制在一定空间边界内,因此各省城市发展效率将对周边省份产生溢出影响,且这种影响因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的差异呈现空间加权特性(通过 $\prod A^\gamma w$ 刻画)。 γ 表示空间外溢形成的省份间发展技术依赖程度(γ 介于 0 到 1 之间),各省份该参数相同,但特定省份技术水平外溢的城市化效应还依赖于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理距离,更应强调城市化关联性),因此研究应从空间系统性视角展开,不能将省份孤立开来。

对式(2)进行变换,并以矩阵形式表示,得到空间权重条件下的技术水平模型;其中 W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对应为 31×31 的省份空间关联矩阵。该模型中,省域 i 的城市化率依赖于本省经济发展状况、政府城市化意志倾向以及中央政府的意志导向。同时,其城市化水平对邻近省份城市化进程具有影响,并受到中央政府和邻近省份政府意志转变的影响(式(8))。为表述方便未将式(9)模型参数标志与其他公式对应,构成空间面板模型的基本形式,进一步将省份政府意志、经济发展的空间交互过程纳入分析,展开主题的空间定量检验。具体的,通过省域技术水平空间依赖性的假设,将经济行为与邻近省域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战略安排相关联,从空间维度测度邻近省份要素变动对本省城市化推进的贡献和影响。

$$\ln A_i = \ln \Omega_i + \phi \ln Z_i + (\varphi \ln D_i) + \theta \ln X_i + \gamma W \ln A \quad (4)$$

$$\ln A_i = (I - \gamma W)^{-1} \ln \Omega_i + \phi (I - \gamma W)^{-1} \ln Z_i + (\varphi (I - \gamma W)^{-1} \ln D_i) + \theta (I - \gamma W)^{-1} \ln X_i \quad (5)$$

$$(I - \gamma W)^{-1} = \sum_{r=0}^{\infty} (\gamma W)^r = \sum_{r=0}^{\infty} (\gamma)^r (W)^r = \sum_{r=0}^{\infty} (\gamma)^r = 1/(1 - \gamma) \quad (6)$$

$$A_i = \Omega_i^{1/(1-\gamma)} Z_i^\phi (D_i^\varphi) X_i^\theta \prod_{j \neq i}^N Z_i^{\phi \sum (\lambda w_{ij})^r} D_i^{\varphi \sum (\lambda w_{ij})^r} X_i^{\theta \sum (\lambda w_{ij})^r} \quad (7)$$

$$U_i = \frac{1}{1-\gamma} \ln \Omega + (\alpha + \phi) \ln Z_i + (\beta + \varphi) \ln D_i + (\tau + \theta) \ln X_i - \alpha \gamma W \ln Z_i - \beta \gamma W \ln D_i - \tau \gamma W \ln X_i + \gamma W U + v_i \quad (8)$$

$$U_i = c + \alpha \ln Z_i + \beta \ln D_i + \tau \ln X_i + \chi W \ln Z_i + \delta W \ln D_i + \rho W \ln X_i + \gamma W U + v_i \quad (9)$$

(二) 变量设定

U 为被解释变量,以省份城镇化率描述; Z 和 D 为本文最为核心的解释变量,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推进意志。政府意志如何度量?作为解决方案,本文利用历年国务院和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对城市化相关有效词频进行了检索和分类,描述意志的倾向、差异和调整过程。其适宜性在于:《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反映“上一年工作成果”、“制定总体部署”、“提出当年规划”的重要文本窗口,一切内容都严格地以政府的意志为纲领,特定词语

出现的时间、背景和频次等都经过深思熟虑,因此,利用相关有效词频展开城市化意志分析不失为一项较为客观且有效的研究手段。此处,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意志的分异,更可用以识别两级政府目标表达的差异对城市化实践的作用差异和引导效果(陆铭等,2013;姚震宇,2011)。简言之,依靠《政府工作报告》抽取有效词频,在研究不能做到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的约束下,可解决难以定量且连贯地描摹政府意志的难题,亦能体现“块块”竞争下两级政府意志对城市化的引导功能,因此可视为反映政府意志表达的较优良变量选择。

此外,经济发展以及与城乡、人口相关的结构性变量亦纳入本文分析,从而对人口城乡流动的推力、拉力及人口因素进行控制,分别对应产业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描述)、投资规模(以固定资产投资描述)、城乡收入差距(反映人口流动的拉力)、人口总量变化(反映人口流动的推力)以及人口抚养比(反映人口年龄结构,该变量对未来人口总量变化的约束作用显著),具体统计口径见表1。为进一步探讨政府意志作用于区域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中亦通过纳入政府意志变量与渠道变量交叉项的方式展开深入剖析。

表1 主要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变量名	变量定义与指标选取	样本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U	$U=(\text{城镇人口}/\text{年末总人口})\times 100$	372	47.77	15.14	19.30	89.60
Z	$Z0$ “城市化”有效词频(中央)	372	24.00	6.70	16	41
	$Z1$ “市化”有效词频(中央)	372	9.83	4.38	3	21
	$Z2$ “镇化”有效词频(中央)	372	10.83	4.76	3	18
	$D0$ “城市化”有效词频(地方)	372	43.46	21.83	5	130
	$D1$ “市化”有效词频(地方)	372	19.05	14.60	0	100
	$D2$ “镇化”有效词频(地方)	372	18.19	10.08	1	56
INS	$INS=(\text{第二、三产业产值}/\text{GDP})\times 100$	372	40.10	7.97	28.60	76.85
INV	$INV=\text{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372	6 102.72	6 336.81	106.58	36 789.07
GAP	$GAP=\text{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text{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372	3.05	0.62	2.03	5.53
$DPOP$	$DPOP=\text{年末总人口差值(当年-上年)(万人)}$	372	23.48	94.17	-513.00	890.00
$DEPR$	$DEPR=\text{抚养比}=(1-\text{劳动人口}/\text{总人口})\times 100$	372	37.18	6.92	19.2700	55.09

注:相关关键词词频统计数据根据384份政府工作报告手动整理,此处对关键词的相互替代问题和非有效关键词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处理,且“城市化”有效词频=“市化”有效词频+“镇化”有效词频+“无明确市化和镇化”有效词频;其他经济变量主要依据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泰安地区经济数据库获得。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为展开政府意志视角的城市化空间推进机理分析,本文基于国泰安地区经济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对城镇化、人口、投资等经济变量进行了整理;政府意志刻画指标统计中,本文整理和阅读了历年国务院和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经由专门叙述作为识别依据对有效关键词和词频构成进行分析,依托于细致和繁琐的有效词频抽取工作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意志进行了量化描述,更对“市化”和“镇化”路径选择进行了甄别。

具体的,本文首先获取384份报告文本,进行初读了解城市化推进的相关政策导向;其次,确定以有效关键词词频刻画政府意志变量,因为单纯的词频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①;其

①此处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建设性意见,指出应利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关于城镇化或是城市化问题的叙述作为有效关键词的识别依据,本文赞同并采纳了审稿人建议,进行了修正和数据的重新整理。

一,词频的相互替代问题,文本中“城市”和“城镇”关键词本身有时并不指示市化还是镇化道路,而有可能是为避免文字上的重复,利用两词语进行相互替代;其二,词义内涵的一致性,文本中部分城、城市、城镇关键词很可能并不指向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意愿。例如,我们很容易在报告中发现“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就业率”、“城市绿化面积”、“城镇新增就业”等等语句,这些关键词与城市化推进并无关系。所以,直接采用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判断依据,是很值得怀疑的,需进行校对处理。因此,本文最后逐篇阅读了报告文本,并以是否为专门描述市化和镇化的内容作为有效关键词的识别依据,并着重处理前述两个严重问题,投入大量精力手工剔除了非有效关键词、识别了互相替代词频,具体采用“城”、“市”、“镇”、“县”四个关键词作为索引,逐条阅读包含以上关键词的语句识别是否描述了城市化发展问题,最终形成“市化”、“镇化”和“无明确市化和镇化”倾向的有效词频数,其中第三类词频仍旧纳入总体城市化意志范畴,但不做市化或镇化识别结果,从而有效反映报告文本所承载的意志信息。文本可查阅网站“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3年)^①及“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汇编”(2003-2013年)^②获取。

最终样本跨期为2002-2013年,覆盖31个省级行政单位,总样本量372。样本期选择原因如下:(1)统计标准变化。人口普查是各省市城镇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但在2000年之前因统计口径和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动,城镇化指标存在较为明显的不一致性(沈建法,2005);自第五次人口普查起采用常住人口口径,指标可比性得到较好保障。(2)报告文本可得性。本文兴趣点在于政府工作报告所传达的政府意志,出于资料完整性考虑,以2002年为起点可保证所有省份报告文本可得且完整。(3)中国城市化推进的阶段性。2013年是新型城镇化运动的发端,城市化路径或将发生诸多改变,因此在此之前的政府意志表达和政府行为反应更具代表性;同时,行政主导城市化较快发展的时期是1984-2002年(张车伟、蔡翼飞,2012),主要表现为县镇数量的增加,本文研究区间置于2002年之后,县镇数量变化很小,从样本选择层面避免了花费过多精力于区划调整导致的城市化推进因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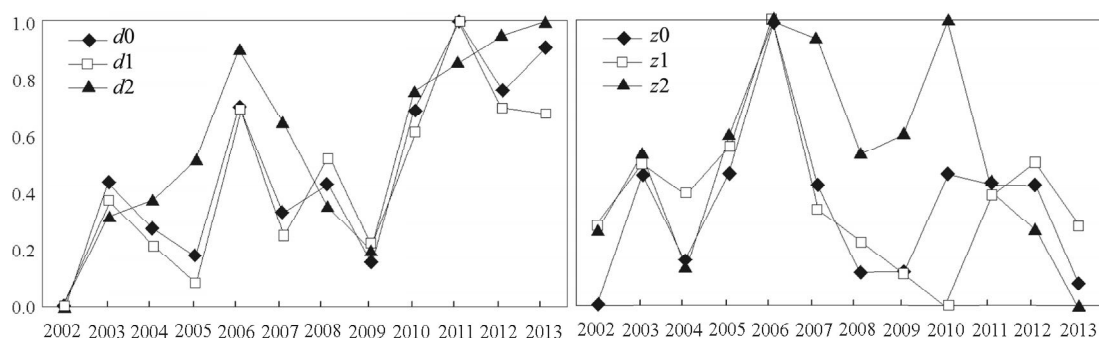
城市化层面,中国省域城市化推进具有特定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差异性。时间维度,省域城市化实现了快速的整体推进;空间维度,各省城市化水平和推进速度各不相同,空间异质特征明显。在样本期内,省份城市化差异最大的为2010年的西藏和上海(对应城镇化率22.7%和89.3%),两者亦为极值省份,差值最小的年份为2003年(相差59.1%);从推进速度来看,各地方政府努力推进区域内城镇化进程,相比于期初(2002年)城市化水平提升最大的为重庆市,最小的为吉林省;从区域平均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2013年平均城市化率分别为66.9%、50.9%和45.4%,从而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非平衡梯度格局,空间关联性展露无遗(其中东北三省有其特殊性,早期业已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但总体推进速度缓慢)。^③此部分结果与张车伟和蔡翼飞(2012)等文献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是本文将对决定城市化水平的政府意志因素和空间效应展开识别性研究。

①参见 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19.htm。

②参见 www.gov.cn/test/2006-07/25/content_344709.htm。

③以上城市化率数据由作者根据国泰安数据库和历年《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提供的城镇人口和总人口数据计算并梳理获得。

意志表达层面,政府意志呈现中央和地方两级分异性。中央层面,推进城市发展的统一意志倾向并非一直上升,且市化和镇化倾向中存在时间维度的异质性选择。根据图1,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的关注度层面对总体城市化、市化和镇化的关注趋势具有一致性,2007-2010年对城镇的关注度相对更高,之后又趋于一致但体现为推进城市建设的倾向。地方层面,省份差异明显且对市化和镇化有不同侧重,但平均变化趋势上,总体意志与市化、镇化意志的变化基本一致,结构化指标被均值替代导致其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对城市化推进的异质性意志,需着重关注因地制宜或“官员”主导的地方政策执行偏好。根据已有经验(如周靖祥,2015),中央目标在“稳”,地方目标则在“增”,央、地城市化推进的反应机制,实则是“中央权威”和“地方利益”互相权衡的表达结果;因此形成了投资增速23%,城镇化增速14%的经济发展轨迹,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推进城市化的信号。根据变化趋势对比,地方政府除却各省市间差异外,均值表现与中央政府引导方向也有较大区别,2010年之前地方政府意志表达平均倾向波动情况与中央引导较为一致,但2011年之后开始呈现较大分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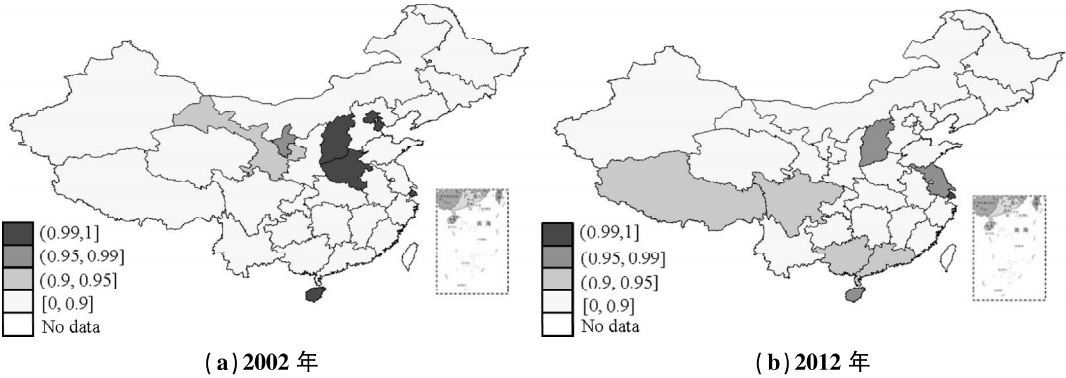
注:相关指标为便于观察趋势变化对比,进行了单位化处理,处理方法为指标值 $= (x_i - \min) / (\max - \min)$, x_i 代表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应类别词频, $\min$ 和 $\max$ 为相应指标最小值和最大值;省份因有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本图以均值指标反映。

图1 政府意志均值表现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一) 政府意志作用于城市化的初步检验

政府意志左右着中国区域城市化的推进进程。大城市的辐射作用、中小城镇的人口疏散作用以及推进方式选择共同构成了经济和人口集散之外的约束力量,而这些因素与政府意志有密切关联,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推动城市化“风潮”做出了不懈努力,“市化”和“镇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城市化政策的实施无不体现着两级政府的意志影响。因此,本文着重探讨政府意志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审视“中央-地方”管理体制下意志安排的潜在影响和空间路径,定量检验以空间修正的城市化评价模型展开。本文选择基于发展水平和地理距离因子的空间权重矩阵无疑具有优越性,元素大小可部分反映城市化实现的经济和人口拉力作用。此外,扩展Elhorst(2012)程序代码得到面板Moran程序,结果表明Moran I等于0.125(统计量值4.457)在1%水平上显著,且年度条件Moran指数和均值Moran指数差异较大,即在控制非空间性的省份政府意志、城市化推拉、人口因素力量之后,模型依然呈现明显空间关联性,因此选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模型展开处理和分析具有适用性;当然,从局部显著性来看,城市化格局仍存在空间上的演变和模式形态的变化,省份结构差异显著(见图2)。



注:由作者绘制,其中以灰暗度描述了局部地区的显著性,颜色越深越显著。

图2 局部 Moran 统计值(2002 年和 2012 年)

经由对混合效应模型(OLS)、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LM和LMrobust检验,结果支持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展开实证分析,同时前文理论模型亦表明SDM具有适用性。再进一步保障模型的可信性,本文采用误差修正条件(Lee and Yu, 2010)下的SDM程序展开估计。

论文从中央和地方政府意志倾向出发,展开城市化推进的空间计量分析,那么政府意志水平项(Z)系数和空间加权项($W \times Z$)系数可表征政府意志作用于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关联强度:水平项系数表征意志的直接作用,加权项系数反映其间接影响(见表2)。

表2 政府意志导向作用的空间效应检验(无交互作用)

因变量:urate	Z0	Z1	Z2	D0	D1	D2
Z	0.037 (0.665)	0.049 (0.553)	0.094 (1.095)	0.080 *** (4.709)	0.169 *** (5.806)	-0.140 *** (-2.912)
INS	0.989 *** (13.202)	0.990 *** (13.205)	0.986 *** (13.160)	0.919 *** (12.364)	0.867 *** (11.588)	0.954 *** (12.687)
INV	-0.000 *** (-4.909)	-0.000 *** (-4.894)	-0.000 *** (-4.864)	-0.000 *** (-5.098)	-0.000 *** (-4.254)	-0.000 *** (-4.196)
GAP	-8.742 *** (-9.698)	-8.741 *** (-9.694)	-8.745 *** (-9.699)	-8.168 *** (-9.242)	-7.760 *** (-8.837)	-8.526 *** (-9.520)
DPOP	0.009 ** (2.172)	0.009 ** (2.182)	0.009 ** (2.166)	0.009 ** (2.223)	0.010 ** (2.546)	0.009 ** (2.274)
DEPR	-0.683 *** (-7.958)	-0.684 *** (-7.962)	-0.681 *** (-7.937)	-0.758 *** (-8.928)	-0.742 *** (-8.968)	-0.642 *** (-7.457)
W×Z				-0.051 * (-1.749)	-0.060 (-0.966)	0.013 (0.135)
W×INS	-0.477 *** (-4.185)	-0.472 *** (-4.124)	-0.460 *** (-4.009)	-0.433 *** (-3.903)	-0.433 *** (-3.953)	-0.438 *** (-3.805)
W×INV	0.001 *** (5.343)	0.001 *** (5.346)	0.001 *** (5.472)	0.000 *** (4.196)	0.000 *** (4.476)	0.001 *** (4.992)
W×GAP	0.575 (0.274)	0.709 (0.338)	0.205 (0.097)	0.947 (0.453)	1.728 (0.875)	1.317 (0.600)
W×DPOP	0.010 (0.998)	0.011 (1.040)	0.009 (0.909)	0.011 (1.054)	0.008 (0.826)	0.012 (1.151)

续表 2 政府意志导向作用的空间效应检验(无交互作用)

因变量:urate	Z0	Z1	Z2	D0	D1	D2
$W \times DEPR$	0.832 *** (5.515)	0.818 *** (5.419)	0.841 *** (5.574)	0.853 *** (5.726)	0.820 *** (5.578)	0.787 *** (5.250)
$W \times dep.var.$	0.419 *** (5.774)	0.415 *** (5.693)	0.404 *** (5.493)	0.435 *** (6.050)	0.450 *** (6.348)	0.402 *** (5.470)
R -squared	0.787	0.787	0.788	0.799	0.805	0.792
corr-squared	0.763	0.763	0.765	0.776	0.782	0.768
σ^2	48.676	48.718	48.694	45.876	44.476	47.671
Nobs, Nvar, #FE	372, 11, 10	372, 11, 10	372, 11, 10	372, 13, 12	372, 13, 12	372, 13, 12
log-likelihood	-1255.522	-1255.576 ***	-1255.207 ***	-1244.935 ***	-1239.600 ***	-1251.207 ***
Wald_spatial_lag	61.227 ***	62.718 ***	62.292 ***	57.974 ***	61.262 ***	65.641 ***
LR_spatial_lag	47.211 ***	49.731 ***	47.608 ***	43.375 ***	47.807 ***	52.530 ***
Wald_spatial_error	27.043 ***	28.805 ***	27.158 ***	22.408 ***	23.552 ***	30.794 ***
LR_spatial_error	29.891 ***	31.443 ***	30.023 ***	24.779 ***	26.631 ***	34.564 ***
Hausman test	1102.550 ***	1087.270 ***	1119.468 ***	1791.431 ***	1525.632 ***	1371.017 ***

注:括号内表示对应系数的 t 检验值;*、**和***分别对应 10%、5%和 1%显著水平,后文同此处。特别的,相同年份中央意志指标对各省份不具差异,由于空间矩阵 W 具有行标准化特征,因此 $W \times Z = Z$,导致空间加权过程实则是 Z 的水平项的完全共线性变量,剔除 $W \times Z$ 项后展开估计,技术上并不能识别中央政府意志变量的空间关联性识别结果;效应分解中亦对此进行修正。

结果表明,其一,政府意志作用具有明显的中央-地方异质性,根源于政府层级推进倾向的分歧。中央政府意志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统一的意志表达并未体现出对城市化水平的统计影响;与之鲜明对应,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强调显著促进了省份城市化,系数为 0.080 在 1%水平显著。中央意志系数不显著,地方意志系数显著,充分展示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推进意志表达和实际影响上呈现的分歧:中央政府对城市化的影响更主要是意志引导上的影响,并不具备显著的直接作用过程,若要形成具体作用效果则还需要通过引导性促成地方政府的承接;而地方政府强调“本地区”发展和竞争考虑,快速推进城市化成为其数字目标之一。 $W \times Z$ 系数反映邻近省份政府意志的间接影响,邻近区域意志强度的提升表现出对本地区城市化的抑制,但此种作用仅表现为总体推进倾向层面的影响,而非不同城市化路径选择的差异。

其二,中央和地方政府意志影响效果差异明显,且城市化实践最终分化为“市化”和“镇化”两类。根据表 2,中央政府城市化意志未能形成对单个省份城市化显著的直接影响($Z0$ 、 $Z1$ 和 $Z2$ 模型中意志系数均不显著),地方政府意志则更易形成城市化推进动力,表现为模型 $D0$ 中意志变量系数为 0.080 在 1%水平显著;此种显著差异,亦可佐证中央政府意志的表达和作用发挥需以地方政府的传达和执行为保障,地方政府在领会中央政府意志的同时也会有异质发展决策。同时,城市化实践的分化也有不同效果,侧重城市发展较之县镇发展更能迅速推进本地区城市化,表现为 $D1$ 和 $D2$ 模型中意志变量系数为 0.169 和 -0.140 均在 1%水平上显著,省份“市化”意志的强化促进了本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被寄予厚望的“镇化”则呈现抑制作用,省份发展实践具有现实约束,结构差异要求分解两种道路的实际效果。此时,空间加权项不显著,意志影响溢出可能需要特定的渠道发生。

其三,人的流动和非农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引致因子,推进区域城市化需重塑人的本位特

征;资本和收入差距也是人口转移的相关因素。结果上, INS 介于 $0.867 \sim 0.990$ 之间且显著,非农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基础; $W \times INS$ 为负且显著,即邻域产业发展对本地区有反作用,深层机理离不开一句老话:“人往高处走”。为识别这一机理,引入人口增量 $DPOP$,系数稳健且显著,由中国区域人口的机械增长特征可知跨区人口流动是重要推力因素;对 $DEPR$,本地人口负担不利于省域城市化、邻域人口负担间接推动本地城市化,这主要源于人口流动以中青年劳动力为多。此外, INV 和 GAP 为负的结论与既有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课题组,2011;周靖祥,2015)有所差异。究其原因,资本密集投入过快的实现了城市扩张但并未实现人口城镇化,导致城市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降低(沈可、章元,2010),同时资本具有空间溢出性($W \times INV$ 系数为正且在 1% 水平显著),综合影响为正(见效应分解表 4 和表 5)。地区内城乡差距并未形成显著拉力的症结则在于,中国人口自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方向性”并非在省内农村和城市间进行配置,而是在不同区域空间上重新分布;反向理解,可能的机理在于高收入差距省份人口流动性也更强,但其目的地主要是高城市化地区或者低差距地区,而非本省流动。

(二) 政府意志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机制渠道

以新视角重新审视政府意志变量发挥作用的可能渠道,空间驱动机制过程将更为清晰。本文接下来引入政府意志与解释变量交叉项,并基于乔莱斯基分解(LeSage and Pace,2009)识别直接和间接效应,展开中国区域城市化推进的空间驱动机制探讨。具体的,认识到城市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集聚,同时又是政府意志引导的结果,本文引入意志变量与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和人口增量的交叉项对模型进行扩展,因此其回归系数即对应政府意志在地区城市化推进中的空间作用渠道和路径,本文依据表 3 重点阐释三种支撑渠道。

表 3 政府意志导向作用的空间效应检验(有交互作用)

因变量: $urate$	$Z0$	$Z1$	$Z2$	$D0$	$D1$	$D2$
Z	0.196 (0.194)	1.076 (0.533)	0.929 (0.464)	-1.501 *** (-6.288)	-1.632 *** (-4.601)	-2.209 *** (-3.990)
INS	0.939 *** (3.681)	0.987 *** (5.371)	0.937 *** (5.308)	0.179 (1.404)	0.463 *** (4.954)	0.595 *** (4.891)
INV	-0.000 (-0.313)	-0.000 (-1.487)	-0.000 (-0.595)	0.000 *** (2.816)	0.000 *** (2.439)	-0.000 *** (-0.231)
GAP	-8.676 *** (-9.677)	-8.774 *** (-9.728)	-8.789 *** (-9.838)	-7.865 *** (-9.761)	-7.806 *** (-9.603)	-7.556 *** (-8.589)
$DPOP$	0.051 (1.002)	0.008 (0.871)	0.027 (1.586)	-0.002 (-0.155)	0.015 ** (2.572)	-0.008 (-0.763)
$DEPR$	-0.695 *** (-8.109)	-0.691 *** (-8.015)	-0.695 *** (-8.056)	-0.569 *** (-7.029)	-0.559 *** (-6.624)	-0.729 *** (-8.850)
$Z \times INS$	0.002 (0.170)	-0.000 (-0.018)	0.004 (0.240)	0.019 *** (6.807)	0.021 *** (5.529)	0.027 *** (4.072)
$Z \times INV$	-0.000 (-0.837)	-0.000 (-0.350)	-0.000 ** (-2.350)	-0.000 *** (-4.668)	-0.000 *** (-4.566)	-0.000 ** (-1.956)
$Z \times DPOP$	-0.002 (-0.818)	0.000 (0.228)	-0.001 (-1.042)	0.000 (0.950)	-0.000 (-1.210)	0.001 * (1.916)
$W \times Z$				1.437 *** (2.777)	0.464 (0.512)	2.463 *** (2.050)
$W \times INS$	-0.517 * (-1.905)	-0.459 ** (-2.266)	-0.439 ** (-2.258)	0.277 * (1.807)	-0.089 (-0.712)	-0.007 (-0.043)
$W \times INV$	0.000 (0.623)	0.000 (1.308)	0.000 (1.488)	0.000 (1.571)	0.000 (1.519)	0.001 ** (2.314)

续表 3 政府意志导向作用的空间效应检验(有交互作用)

因变量:urate	Z0	Z1	Z2	D0	D1	D2
$W \times GAP$	-0.049 (-0.024)	0.592 (0.279)	-0.118 (-0.055)	0.776*** (0.403)	3.317* (1.747)	-0.780 (-0.372)
$W \times DPOP$	0.387*** (2.807)	0.045 (1.558)	0.033 (0.685)	-0.104*** (-3.595)	-0.010 (-0.618)	-0.081*** (-3.813)
$W \times DEPR$	0.814*** (5.336)	0.800*** (5.244)	0.868*** (5.551)	0.697*** (3.987)	0.678*** (4.171)	0.794*** (4.260)
$W \times Z \times INS$	0.002 (0.203)	-0.006 (-0.356)	-0.008 (-0.499)	-0.017*** (-3.041)	-0.006 (-0.622)	-0.032** (-2.340)
$W \times Z \times INV$	0.000 (0.696)	0.000 (0.474)	0.000 (1.634)	-0.000 (-0.685)	-0.000 (-0.599)	-0.000 (-0.458)
$W \times Z \times DPOP$	-0.014*** (-2.737)	-0.003 (-1.294)	-0.002 (-0.547)	0.003*** (4.097)	0.001 (1.216)	0.006*** (5.359)
$W \times dep.var.$	0.394*** (5.277)	0.407*** (5.533)	0.432*** (6.014)	0.430*** (6.047)	0.400*** (5.315)	0.415*** (5.840)
R-squared	0.794	0.814	0.812	0.834	0.835	0.813
corr-squared	0.775	0.794	0.789	0.816	0.822	0.790
sigma ²	47.481	48.444	47.368	38.039	37.641	42.648
Nobs, Nvar, #FE	372, 17, 16	372, 17, 16	372, 17, 16	372, 19, 18	372, 19, 18	372, 19, 18
log-likelihood	-1250.265	-1254.323	-1250.807	-1209.957	-1207.217	-1230.827
Wald_spatial_lag	66.732***	63.829***	65.446***	102.858***	60.207***	110.714***
LR_spatial_lag	53.989***	49.201***	48.688***	85.857***	54.064***	88.729***
Wald_spatial_error	35.971***	28.014***	28.036***	54.804***	31.762***	69.388***
LR_spatial_error	37.255***	29.980***	29.837***	76.647***	43.505***	74.714***
Hausman test	1122.469***	984.327***	1184.209***	6340.183***	7416.850***	2356.066***

其一,结构调整渠道。诚然,产业的迅速调整是促成中国区域城市化加速实现的重要因素,依赖于市场和政府的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单向性。中央政府意志模型中, $Z \times INS$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国家层面统一的城市化推进安排并不会通过省域有显著差异的产业条件形成影响,其空间交互项亦表明并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地方政府意志模型中,政府意志的产业结构渠道对本地区城市化推进有促进作用($D0$ 、 $D1$ 和 $D2$ 模型中 $Z \times INS$ 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高非农化地区意志表达更易形成快速的城市化,且这种推进中镇化意志的作用效果更强。此外, $W \times Z \times INS$ 在 $D0$ 和 $D2$ 模型中显著为负,表明邻近省份持有的镇化倾向与高非农化交互过程会限制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市化倾向并未表现出这种交互溢出性。当然,不论是何种倾向,较高的非农化产业结构调整都是城市化的重要基础。

其二,资本投入渠道。区域城市化不仅受到政府意志的直接影响,而且存在依赖于投资水平的效应渠道,体现意志作用发挥的资本渠道和约束。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模型中, $Z \times INV$ 仅在镇化意志表达中表现显著性,系数为负;地方政府模型中, $Z \times INV$ 均为负且显著。表明意志化显过程与政府干预手段有重要关系,但其效果却并不一定理想。具有更高投资水平的省份在推进镇化意志过程中,反而形成对本省城市化的约束力量,深层次思考其表现,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央政府“促进小城镇发展,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意志表达条件下,其资本支撑效应实则对城市化水平提升有反作用和制约力。反观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地方政府在锦标赛式竞争中不断强化城市建设,目的在于经济和城市的扩张,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口的“城镇化”,政府意志通过影响资本配置方式再影响城市化过程。

其三,人口增长渠道。渠道指标项中, $Z \times DPOP$ 在中央模型中不显著;地方模型中,城镇化意志通过人口集散对城市化有正向效果(系数为0.001在10%水平上显著)。空间交互项中, $Z0$ 模型系数为-0.014显著, $D0$ 和 $D2$ 模型系数分别为0.003和0.006显著。人口增长渠道的影响在空间溢出项目中更为明显,原因何在?笔者发现,城市发展和区域重构过程中,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异更为重要,“外乡人”成为维持城市不断扩张的主动动力,人口变动的跨省空间配置属性依旧是影响地方城市化过程实现的重要因素,政府从意志倾向和政策导向上都会关注和疏导此配置过程,因此结果符合现实机理。此外,城镇化意志表达通过人口增量渠道对省域城市化进程有重要影响,以中小城市和县镇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化”,需要人口集中作为其基础,同时又成为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疏散口”。因此各地方政府应谋划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选择,合理引导人口流入和安置,从人的视角出发争取未来的长远发展。

(三) 城市化推进的空间传导路径

与解释变量的交叉作用,说明政府意志总效应发挥依赖于渠道要素的支撑,是“有条件的”的空间驱动过程。为对城市化推进的空间传导路径进行检验,本文以表4和表5展示了基于乔莱斯基分解和重复抽样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反映地区内部因素对城市化推进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机理,间接效应体现地区关联和空间扩散路径。

表4 无交互效应的直接间接效应分解

因变量; <i>urate</i>		Z0	Z1	Z2	D0	D1	D2
直接效应	Z				0.079***	0.169***	-0.142***
	INS	0.984***	0.986***	0.983***	0.919***	0.863***	0.952***
	INV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GAP	-8.979***	-8.950***	-9.000***	-8.343***	-7.910***	-8.670***
	DPOP	0.010***	0.010**	0.010**	0.010**	0.011**	0.010**
	DEPR	-0.643***	-0.646***	-0.637***	-0.720***	-0.701***	-0.610***
间接效应	Z				-0.029	0.029	-0.066
	INS	-0.106	-0.107	-0.102	-0.061	-0.073	-0.092
	INV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GAP	-5.002*	-4.624	-5.450*	-4.415	-3.178	-3.573
	DPOP	0.023	0.024	0.020	0.026	0.023	0.025
	DEPR	0.899***	0.875***	0.920***	0.894***	0.851***	0.869***
总效应	Z				0.051	0.199*	-0.208
	INS	0.878***	0.880***	0.881***	0.858***	0.789***	0.861***
	INV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GAP	-13.981***	-13.574***	-14.450***	-12.758***	-11.088***	-12.243***
	DPOP	0.034*	0.035*	0.030*	0.036**	0.034*	0.035**
	DEPR	0.256	0.230	0.284	0.174	0.150	0.259

表5 有交互效应的直接间接效应分解

因变量; <i>urate</i>		Z0	Z1	Z2	D0	D1	D2
直接效应	Z				-1.445***	-1.645***	-2.105***
	INS	0.922***	0.982***	0.943***	0.204*	0.473**	0.614**
	INV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GAP	-8.922***	-8.989***	-9.076***	-8.069***	-7.788***	-7.831***
	DPOP	0.076	0.012	0.030	-0.010	0.015***	-0.013
	DEPR	-0.660***	-0.651***	-0.645***	-0.533***	-0.528***	-0.689***
	Z×INS	0.002	-0.001	0.003	0.018	0.021**	0.025**
	Z×INV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Z×DPOP	-0.002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Z×DEPR						

续表 5 有交互效应的直接间接效应分解

因变量:urate		Z0	Z1	Z2	D0	D1	D2
间接效应	Z				1.279	-0.338	2.530
	INS	-0.226	-0.098	-0.067	0.590 ***	0.150	0.393 **
	INV	0.000	0.001	0.000	0.001 **	0.001 *	0.001 **
	GAP	-5.497 *	-5.060	-6.796	-4.478	0.269	-6.439 *
	DPOP	0.652 ***	0.080	0.075 **	-0.178 ***	-0.006	-0.138 ***
	DEPR	0.858 ***	0.863 ***	0.967	0.777 ***	0.733 ***	0.805 ***
	Z×INS	0.004	-0.010	-0.010 ***	-0.015	0.004	-0.034
	Z×INV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Z×DPOP	-0.024 ***	-0.005	-0.004	0.005 ***	0.001	0.011 ***
总效应	Z				-0.166	-1.983	0.425
	INS	0.697 ***	0.884 ***	0.876 ***	0.795 ***	0.623 ***	1.007 ***
	INV	0.000	0.000	0.000	0.002 ***	0.001 **	0.001 *
	GAP	-14.419 ***	-14.049 ***	-15.872 ***	-12.547 ***	-7.519	-14.270 ***
	DPOP	0.728 ***	0.092 *	0.106	-0.188 ***	0.009	-0.151 ***
	DEPR	0.198	0.212	0.322	0.244	0.205	0.117
	Z×INS	0.006 **	-0.010 ***	-0.007 **	0.003	0.026 *	-0.009
	Z×INV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 **	-0.000
	Z×DPOP	-0.026 ***	-0.005	-0.006	0.006 ***	0.001	0.012 ***

无交互模型中,城市化推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是以直接效应为主,间接效应并非全部显著。总效应层面,“市化”意志对城市化推进有显著正影响,而“镇化”意志作用系数并不显著;直接效应层面,对城市建设的关注利于本地区城市化推进,而关注城镇则制约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上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虽然在意志上遵循了中央政府关于“镇化”的统一安排,但具体执行却更倾向城市而非县镇建设,这是最优化目标选择的结果。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抚养负担变量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性(对应效应值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投资行为的空间外部性明显;抚养比例效应结果则指明相对更年轻化或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本地区的城市化推进;政府意志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过程。当然,以上分析仅是未充分分解政府意志作用渠道条件下的结果,难免受制于“平均的”结论而忽视结构性和空间传导路径,因此接下来内容将基于包含交互效应的空间溢出分解结果展开。

有交互模型中,结果指向并不显著的意志影响总效应,与无交互模型的差异原因可解释为政府意志作用渠道的效应分解。政府意志作用发挥依赖于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和人口增长的支撑,但在空间传导路径上“市化”和“镇化”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表现不一。直接效应层面,Z×INS 和 Z×DPOP 等存在正向显著性,Z×INV 为负向显著,因此顺应产业结构现状促进城市优化建设,基于人口基础强调镇化的人口吸纳过程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政府意志与资本的交互效应说明两者间缺乏协调性,资本的投向并非政府意志导向之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并未做好人的城镇化转移。间接效应层面,产业、投资和抚养负担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传导性,产业调整渠道和人口支撑渠道是政府意志作用的主渠道,其中产业结构体现为对镇化的约束,人口体现为对总体城市建设的约束。即其空间驱动过程呈现为产业调整的外部性和人口的区域间流动两方面,前者是工业和服务业集聚促成城市化的过程,后者则与区域人口的机械增长密切相关,人的空间流动成为决定城市发展和政府意志得以贯彻的空间驱动力量。

(四) 稳健性分析

稳健分析主要有:其一,对 OLS、LSDV、SAR_FE 模型等进行了估计,结果对比表明,空间关联的引入十分必要,用以反映城市化问题的溢出性;其二,以一阶邻近矩阵重新估计模型

进行稳健性检验,基本系数结果和结论仍具有一致性,同时考虑到对经济内涵的考察更甚于拟合优度的选择(侯新烁等,2013),因此认为本文矩阵选择较为合理;其三,出于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化实现的重要条件考虑,本文在有交互作用模型中引入了人均GDP展开稳健性检验,经济水平变量具显著性,但与表3对比,所有变量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均具有较强一致性。综上所述,认为本文结论比较可靠,相关结果可向作者索取,不再赘述。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政府意志与空间城市化机制切题,实为反思和质诘中国区域城市化的“运动式”推进过程,探寻外显政府意志推动城市化的作用渠道和空间效应。究问“城市化推进遵循的规律是什么?”,本文抓住政府意志左右城市发展路径这一特征事实,研读传递政府意志倾向的《政府工作报告》(2002-2013年),实现了意志导向视角直接的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作用渠道探讨。结果表明:(1)外在的政府意志表达与城市化推进过程具有明显关联机制;(2)政府意志的影响效果呈现明显的中央和地方异质性,目标非一致性是两级政府行为模式和意志倾向呈现分歧的根源,“市化”和“镇化”映射集中发展和分散发展两种思路;(3)城市化推进并非是没有条件的,政府意志的作用发挥依赖于结构调整渠道、资本投入渠道、人口增长渠道的支撑,市化或镇化意志表达更需“因地制宜”和“顺势而为”;(4)空间驱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调整渠道和人口支撑渠道是政府意志作用的主路径,产业调整的外部性和人口的区域间流动构成空间溢出路径的重要元素。以政府意志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并强调城市化推进的政府主导性和条件性,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 深刻认识中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性,厘清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互动关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来看,城市化与政府意志表达存有内在联系:建国初期,政府工作重点在于经济重建和工业化而非城市化;“上山下乡”则是特定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运动式“逆城市化”过程;而后,在国家改革和开放的战略调整和城市建设的安排下,城市化才开始加速。至当下,在逐渐反思数字化发展之时,地方政府又陷入了对城市化率的数字追求。李克强总理指出:“……必须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①因此,需明确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意志表达的反应机制,本质上是“中央权威”和“地方利益”互相权衡的过程,因此就更要强调政府力量嵌入对城市化推进路径的影响,“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那么各省市不仅要有对本地区支撑条件的明确认知,还需要做到因势利导,依靠国家规划和市场力量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2. 依附于政府行为选择,强调城市化的空间效应,合理应对市化或镇化实践。在中国,空间区位和集聚分布的力量通过中心城市辐射和城市间协同发挥影响,并通过要素和影响渠道的空间传递路径约束区域城市化的推进方式。缘由城市化的阶段性和空间性,沿海和内地面临由政府干预导致的不同困境,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的争论从未停止;至“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出,本地(就地)城镇化、县域城镇化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数据上表现为中小城市、县级城市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大城市和小城镇,其行为在区域连接的空間上设置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疏散口”。因此,强调城市化的空间效应,其一要

^①参见李克强2014年6月“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讲话内容,http://paper.people.com.cn/rmrh/html/2014-06/07/nw.D110000renmrh_20140607_4-01.htm。

认识到城市化推进的时序性和个体特征,充分强调地区异质性;其二需要政府意志设定嵌入对省际溢出效应的分析,规划中纳入地方政府在发展思路上的相互学习和竞争特征。

3.注重疏导区域内、区域间人口的合理流动和流向,通过人口关联形成地区协同。人的城市化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根本,因此推进速度会受限于农村可流动人口数量,未来城市化必然要注重人口流向的空间匹配。在其中,以城市为载体的经济集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体,且劳动力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置于城市化由分散趋向集中的背景下,人的聚集呈现“市化”和“镇化”共同驱动特征,城市群的人口吸纳作用正在增强,如何适宜疏导人的集散过程、发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亟需城市部门对于落户限制和外来人口福利保障制度作出省思:大城市要成为人口的中心承载区,注重人口的疏导和吸纳,不能让城市门槛成为阻碍城乡融合的“玻璃幕墙”;同时,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劳动力产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压力,已经提供了消除区域城镇化差异的各项改革的“倒逼”机制。简言之,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需要的是市化,而不是仅仅滞留在一个次优的“镇化”之中。

参考文献:

- 1.陈斌开、林毅夫,2013:《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辜胜阻,2013:《中国城镇化机遇、问题与路径》,《中国市场》第3期。
- 3.侯新烁、张宗益、周靖祥,2013:《中国经济结构的生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世界经济》第5期。
- 4.何燕、周靖祥,2013:《城市化与城镇化之辩:构建区域联动发展研究新框架》,《重庆大学学报》第4期。
- 5.纪韶、朱志胜,2013:《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格局变动趋势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第12期。
- 6.简新华、黄锬,2010:《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第3期。
- 7.李克强,2012:《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19/c_113137966.htm。
- 8.李强、陈宇琳、刘精明,2012:《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9.李郁、洪国志,2013:《土地财政与城市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土地科学》第7期。
- 10.刘生龙,2014:《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
- 11.龙奋杰、王宁、张艳奇,2010:《影响中国城市增长的因素: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城市发展研究》第10期。
- 12.陆铭、蒋仕卿、陈钊、佐藤宏,2013:《摆脱城市化的低水平均衡——制度推动、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3.陆铭、向宽虎、陈钊,2011:《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世界经济》第6期。
- 14.莫亚琳、张志超,2011:《城市化进程、公共财政支出与社会收入分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3期。
- 15.钱陈、史晋川,2007:《城市化、结构变动与农业发展》,《经济学(季刊)》第1期。
- 16.沈建法,2005:《1982年以来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水平趋势》,《地理学报》第60期。
- 17.沈可、章元,2013:《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长期滞后于工业化?》,《金融研究》第1期。
- 18.王小鲁,2010:《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 19.姚震宇,2011:《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人口城市化目标》,《人口研究》第5期。
- 20.张车伟、蔡翼飞,2012:《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与人口合理分布》,《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21.郑真真、杨舸,2013:《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人民论坛》第11期。
- 2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
- 23.周飞舟,2012:《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三联书店》。
- 24.周靖祥,2015:《中国区域城镇化差异及成因解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25.Au, C. C., and J. V. Henderson.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3): 549-576.
- 26.Elhorst, J. P. 2012.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7(3): 389-405.
- 27.Henderson, J. V., A. Storeygard, and D. N. Weil. 2012.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2): 994-1028.

(下转第54页)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Housing Pattern and Land Use Policy in Urban China: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an Rui¹, Han Yonghui² and Huang Liangxiong²

(1: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ed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housing pattern and land use policy. The basic idea is tha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shape the urban housing demand pattern, while government who makes land use policy has great influence on housing supply, if government ignores the industrial constrain when planning the land use, it's easy to lead to land vacancy, and loss of production and fiscal revenue. Through this model, we mainly discussed three issues. That is, the choic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residential house, market equilibrium residential land alloc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land policies. The analysis led to a simple principle that the structure of residential land supply deviating from the market equilibrium would de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In another words, any adjustment towards the equilibrium would create Pareto improvement. The paper also considered the real difficulties in practicing efficient adjustment, such as one-direction shift, government's disadvantage in information and self-interest motive of officials. We hope this model is helpful for decision makers to consider land, housing, labor and industry as a system, and prevent them from conflict of policy targets.

Keywords: Housing Pattern,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Land Use Policy,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R13, R14, R28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 22 页)

28. Lee, L. F., and J. Yu. 2010. "Estimation of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54(2): 165-185.

29. LeSage, J. P., and R. K. Pace. 2009.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 Boca Raton: Chapman & Hall CRC.

Government Will and Spatial Forc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Hou Xinshuo¹ and Yang Rudai²

(1. 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vernments' will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na's regional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using valid keywords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during 2002-2013, explains the impact mechanisms and spatial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Results show that: spatial-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urbanization exists significantly; governments' will effects are of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from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will play a role depends on the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population's supports, and the population flows across regions is the key spatial driving force. Re-examin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governments' will adjustment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will reshape regional urbanization pattern, but its action is not unconditional. Exogenous will arrangement need to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do things according to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Wil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Keyword Frequency, Spatial Transmission Channels

JEL Classification: R12, R58, C31

(责任编辑:孙永平、陈永清)